

# On the Image of "Educated Youth" in Ba Jin's Novels

Zhang Shengzhang<sup>1,a</sup>, Tian Shiyu<sup>2, b\*</sup>

<sup>1</sup>college of Humanities,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China

<sup>2</sup> college of Humanities, Minjiang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China

<sup>a</sup> zhangzhangstar@163.com

<sup>b\*</sup> 1982195529@qq.com

## ABSTRACT

Ba Jin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riter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tellectuals are his persistent creative themes. He created a 'educated youth' image in his novel, which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types of intellectuals in Ba Jin's novels: the revolutionary youth, the educated youth, the intellectual women, discusses the character and thoughts and the life and fate of intellectuals,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nvironment and personal thought and fate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hows the spiritual growth process of intellectuals from 1920s to 1940s, so as to grasp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Ba Jin's literary creation.

**Keywords:** Educated youth; revolution; ideal;

# 论巴金小说创作中的“知识青年”形象

张胜璋<sup>1, a</sup>, 田时雨<sup>2, b\*</sup>

<sup>1</sup>闽江学院人文学院, 福州, 福建, 中国

<sup>2</sup>闽江学院人文学院, 福州, 福建, 中国

<sup>a</sup> zhangzhangstar@163.com

<sup>b\*</sup> 1982195529@qq.com

## 摘要:

巴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知识分子是他一直执着的创作题材,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知识青年”人物群像,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重要贡献。本文通过分析巴金小说中的三类知识分子:革命青年,知识青年,知识女性,探讨知识分子的性格思想和人生命运,剖析时代背景下社会环境与个人思想、命运意识的关系,展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精神成长历程,以此把握巴金文学创作的内涵与价值。

**关键词:**知识青年; 革命; 理想;

## 1. 引言

知识青年题材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表现领域。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重要转折期,知识青年群体的兴起被认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滥觞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无论是运动的发起者或参与者,都极其重视青年和青年成长问题。这些反抗封建制度、走出旧家庭、追求自由的知识青年是人们想象中的现

代化国家的建设者和主体力量。许多现代作家都书写过这样的“知识青年”形象,描述他们的性情特质、现实困境、反抗斗争,反思他们的命运结局。如鲁迅《伤逝》中的涓生,《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李杰,郁达夫《沉沦》中的“他”等等,他们的遭遇和命运都曾经在广大青年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同情和热烈的讨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的大量自叙传小说中,作为作者的“知识青年”

与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知识青年”具有某种程度的同构关系，“知识青年”成为中国新旧社会转折期的社会现实、情绪、思潮、观念的载体。巴金的大部分作品都关涉知识分子问题，甚至某些知识分子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长廊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发现价值。他谈创作初衷时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是最熟悉的世界。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写得成功，当我写别的类型如矿工时，我就不一定有这种信心。”<sup>[1]</sup>本文主要聚焦于巴金小说的“知识青年”人物群像，以革命青年、知识青年和知识女性三种类型分析人物性格特征，探讨人物命运背后的深层内涵，以期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巴金文学创作的内涵与价值。

## 2. 革命青年形象

巴金《灭亡·序》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我又是一个孤儿”。<sup>[2]</sup>这句话看似文意简单，实际上为全文投影下一层暗灰的基调。爱的痛苦、信仰的召唤与成长的代价交织碰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性的难以协调导致精神的苦痛：“我有一个哥哥，他爱我，我也爱他，然而为了我底信仰，我不得不与他分离，而去去做他所不愿意我做的事情。但是我不能忘记他，他也不能忘记我”。<sup>[2]</sup>《灭亡》是巴金问世的第一部小说作品，此时的他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一个受“五四”新文化思潮和西方现代文明洗礼、在追求个人理想与拯救国家民族的道路上苦苦思索且矛盾挣扎的新青年，用文学的方式建构自我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他的早期小说中塑造的革命青年形象带有鲜明的自我的色彩，这种自我色彩有别于自我的故事，是一种个人浓郁的真实的情绪体验：“本书里所叙述的并没有一件是我自己底事（虽然有许多事都是我看见过，或者听说过的），然而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底悲哀”。<sup>[2]</sup>巴金毫不吝啬地表达对自己笔下主人公的喜爱之情：“我虽不是杜大心的信徒，但我爱他。”<sup>[2]</sup>“我并不崇拜他（陈真），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理想化的典型人物，但我爱他。”<sup>[3]</sup>

《灭亡》《雾》这两篇小说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巴金早期作品的代表。《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和《雾》主人公陈真都是富有激情又性情忧郁的革命青年，他们的抑郁的气质和矛盾的内心是导致人生悲剧的主要构因。杜大心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对个人前途与命运失去希望，却忍住痛苦为反抗专制而拼命工作。他一直在爱与恨的矛盾中苦苦煎熬，对黑暗的社会恨之入骨，认为世间已然无爱，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了希望，对黑暗压迫下的人类的前途与命运失去了希望，却最终因爱——为着他至爱的那些被压迫的同胞们，而决然地用自己的生命反抗，希望能改变一切。这是个人执念、爱的迷茫，更是黑暗的社会力量造就的惨剧。杜大心被人爱过，但他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幸福与爱情，这种绝望、虚无而又要拼死抗争的心态，最终使他丧失了爱情，甘愿做一个为拯救苦难的同胞而复仇的人。杜大心信仰无政府主义，

其思想上有着巴金自我的色彩。在“五四”新思潮的鼓舞下，为了停止“长久不息的奋斗”，而以生命向黑暗复仇，刺杀戒严司令。而对死亡毫不畏惧，“死才能够使他享真安静的幸福。”<sup>[2]</sup>杜大心的牺牲激励了众多的革命青年，革命的后继者们为着同胞的自由而前赴后继。《雾》中的陈真也是位勇敢的反抗者，他放弃优渥的物质生活，义无反顾地同封建家庭决裂，把所有的精力与热情都投入革命工作中，最终得了肺病。陈真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的人生绽放的火花短暂而灿烂，深深影响了李佩珠这样的革命女性。杜大心和陈真看似疯狂的行为代表着五四青年对革命的热情和信仰的偏执。这何尝不是巴金为社会解放道路所做摸索与探寻，也他表达“爱”的原由：“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我是怎样深切地爱着这些小说里的那些人物。”<sup>[3]</sup>巴金曾被认为是一个重视个人自由的政府主义者，而非“革命作家”。其小说塑造人物有类型化的倾向，杜大心和陈真都是有理想的革命者，却不是“理想的革命者”。在追求革命信仰的道路上，杜大心冲动莽撞，缺少斡旋和韧性斗争精神，也不懂得保全自己。陈真身上的优秀品格虽然值得称颂，却少了人性的复杂魅力。他不想花费时间和精力谈恋爱，认为爱情会剥夺自己作为革命者的自由，也不能解决他当前的痛苦和困惑。因为禁欲主义，他一直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正常的人性受到压抑和扭曲，这或许是巴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理想化的典型人物”的原因。

杜大心和陈真都义无反顾地执着于自己热爱的革命事业。杜大心说过“我所负的责任乃是担起人间的恨和自己底恨来毁灭这个世界，以便新世界早日产生。我应该拿起自己底痛苦的一生做例子，来煽起人们底恨，使得这世界早日毁灭，吃人的主人和自愿被吃的奴隶早日灭亡。”<sup>[2]</sup>虽然杜大心莽撞的行为方式并不值得推崇，但他把生死置之度外，这种无畏献身的革命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歌颂的。陈真为了坚定的信仰，叛离舒适的家庭，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爱情乃至生命，他的信仰之爱甚至超越生命之爱。在巴金先生笔下，陈真是可敬可叹的革命青年。

巴金笔下的革命青年总是有着激烈悲郁的感情风格。“我太热情了，我自己这个人就像一座雪下的火山。在平静的表面下，我隐藏了那么强烈的火焰”<sup>[4]</sup>，“我的思想充满着矛盾，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所以我的作品里也有相当浓的‘忧郁性’”<sup>[5]</sup>。面对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旧社会，巴金充满悲愤之情，其追求信仰的过程注定艰难，他将悲愤之情诉诸文字。“贯穿全书的悲哀是我自己的悲哀”<sup>[2]</sup>杜大心、陈真这类革命青年身上体现青年巴金对革命浪漫的向往，具有“感伤”的气息，这种气息在那个时代被赋予反封建的意义，是一种基于现代性根源的美学风格。

## 3. 知识青年形象

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新文化运动之后动荡不安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

了封建大家庭高家走向衰落与崩溃的过程，以及出身于封建家庭的青年人如何冲破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打破旧家庭的樊篱，走向新生活的历程。中国自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侵袭使得中国传统的封建家庭制度逐渐丧失往日的荣威，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封建家庭制度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倍受冲击，加速了其崩溃的过程。新文化运动前后，新的思想文化首先在青年中开始传播。高家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都接受了新思想的熏染，他们疯狂地阅读着《新青年》《少年中国》等传播新思想的刊物，“这些新刊物里面一个一个字想火星一样地点燃他们兄弟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们三个人，使他们并不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sup>[6]</sup>小说中写到，大雪天，觉慧与觉民从学堂走路回家，听见姑妈张太太问他们是否是坐轿子回去的。觉慧马上着急地回答说：“不，我们是走路回来的，我们从来不从轿子”，觉新解释道：“三弟素来害怕人说他坐轿子，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sup>[6]</sup>觉民和觉慧从书本和教员那学到了爱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信仰，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但是，同样受到“五四”新文化思潮影响的高家兄弟却走向不同的命运。

觉新是贯穿全书中最具悲剧意味的主要人物，他在包办婚姻、长房长孙等的封建家庭制度的重压下，被磨平棱角，如傀儡般被自己祖父和父亲随意操控。他“先是放弃了到大学读书的机会，到德国留学的‘美丽的幻想’，放弃了‘那个能够了解他、安慰他的钱家表妹，而在父亲去世了之后，又放弃了与大家庭成员的斗争。生活对于他来说，就是自我不断放弃的过程。”<sup>[6]</sup>他的生命、青春就在各种大家庭的纠纷中被无意义地损耗。他承认自己是个懦夫，不敢面对生活，没有勇气。在祖父逼觉民成亲时，他明知会造成悲剧，还是麻木地成为帮凶；自己的妻子被赶去乡下生产，他也是服从，最后妻子难产而亡。他把家庭责任放在首位，为调和人际关系，处处顺从讨好，成为族人奴役的工具，丧失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小说中，觉慧、觉民就曾多次指出觉新性格的懦弱、思想的守旧，这造成他悲剧人生的原因之一。巴金笔下像觉新这样懦弱的知识青年还有如汪文宣、周如水等，他们都接受过新时代新思想的熏染，却因性情的软弱或其它原因，对封建家庭秩序的腐朽观念妥协退让，并最终造成人生悲剧。

相比之下，觉慧成为最坚决的叛逆者，封建家庭的掘墓人。他在大哥面前朗诵屠格涅夫《前夜》中的句子：“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sup>[6]</sup>他不愿如大哥般忍气吞声地活着，当看到鸣凤、梅、瑞珏被摧残至死后，他愤怒地冲出家门，高呼：“我要做一个叛徒”，<sup>[6]</sup>毅然决然地去上海参加“蓬勃的新文化运动”，去追求自己的人生。巴金在第五版《家》的题词中写到：“读完《家》，我禁不住要爱觉慧。他不是一个英雄，他很幼稚。然而我看见他，就想起丹东的话‘大胆，大胆，

永远大胆’我应该拿这句话来勉励自己”。<sup>[6]</sup>巴金希望能呼唤青年们内心的觉醒，盼望他们能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勇敢地追求理想。觉慧的反抗虽然带有其幼稚与不彻底性，但那个性鲜明的姿态如同“五四”青年的一面旗帜，极大地吸引了青年群体的关注与模仿，成为“激流三部曲”中的一个灵魂人物，现代文学史上的典型形象。

《寒夜》中的汪文宣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其性格胆小怯懦、软弱怕事，在战争威胁和政府压榨的大环境下，竟到了“有话不敢讲，有思想不敢想”的程度。生活的压力和身体的病痛让他不堪重负，家中母亲与妻子间的矛盾又难以调和，最后妻离子散，在疾病的折磨下死去。巴金在《寒夜》附录中说到造成汪文宣这个家庭悲剧的原因：“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是什么样子。”<sup>[7]</sup>《雾》中的周如水同样优柔寡断、胆小怯懦，这注定了他失败的爱情。他在日本留学时喜欢过几个女孩，但每到关键时刻，他总为自己找一个良心上的借口，结果又因女方的离去而陷入痛苦与自责的地步。后来回国后与张若兰相遇相爱，又无法抗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渴望爱情，非但没有勇气主动争取，甚至当张若兰主动表白时，却以常人无法理解的无情方式拒绝自己长久追求的爱情。周如水对待爱情迟疑不敢有所行动，实际上是对封建旧势力的妥协和骨子里埋藏的自私在作祟。后来，他追求不到李佩珠，居然选择了自杀。周如水的爱情悲剧与他自身的性格缺陷有关。他不断为自己设置障碍，并以自我精神世界为中心，当失去爱情这唯一的慰藉时，他的精神世界自然崩塌，只能用自杀这种软弱的方式结束生命。在觉新、汪文宣、周如水这类知识青年身上，我们看到黑暗的社会环境下小知识分子心怀理想却又无力实现的痛苦抑郁和无奈挣扎。黑暗的社会的摧残与压迫确实是悲剧的原因之一，但是自身病态懦弱的人格何尝不是悲剧的底色。巴金通过对这类人物的细致刻画，反映出的是处在历史潮流和文化碰撞中的知识分子内心复杂的感受与状态。

#### 4. 知识女性

在巴金创作出的各类知识青年人物形象中，知识女性的人物形象占有重要位置。这些多彩多姿的女性形象体现出巴金进步的妇女观和对女性前途命运的关注和思考。琴是《家》中最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她出生于封建家庭，和母亲相依为伴，但她是幸运的，非但从小没有缠足，还能去学堂读书。她性格活泼开朗，处处带来笑声，高家兄弟姐妹都喜欢她；她富有同情心，劝慰悲观的梅姐，怜悯淑贞伤残的双脚；她反抗包办婚姻，积极抗争，大胆的向觉民表露自己的爱意，赢得了自由、自主的爱情。琴身上有人人平等的价值观，有“我与男人一样的人”的人的价值观。对待要挣脱的旧制度、旧家庭，琴没有矛盾、沮丧或伤感的情绪，她始终充满着前进的动力。身为女性，

她发出这样的质问：“难道女人只是男人的玩物吗？”

“难道因为几千年来这条路上就浸泡了女人的血泪，所以现在和将来的女人还要继续在那里断送她们的青春、流尽她们的眼泪、呕尽她们的心血吗？”<sup>[6]</sup> 琴的身上所体现出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她虽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显然已经有了初步的女性意识。琴是《家》中希望的火花，“我依旧寄了一线的希望在琴的身上……我只愿琴将来不使我们失望，在《家》中我已经看见希望的火花。”<sup>[6]</sup>

《寒夜》中的曾树生显然要比琴走得更远，她和丈夫一样上过大学，曾怀着爱国热情和教育救国的理想，期望能够创办自己的教育事业。然而曾树生面临着琴所没有的问题：婆媳矛盾、经济困窘以及来自上司的诱惑。作为“新女性”，她并非没有家庭责任感：她坚持送儿子读贵族学校，对婆婆的责难委曲求全。但她不愿意如旧式妇女般被困于家庭之中，不愿过物质拮据的生活，不愿面对昏暗的家、仇视自己的婆婆、病榻上毫无生气的丈夫。再三犹豫之下，曾树生最终选择远去兰州，每个月往家里寄钱，支撑着这个家。“曾树生的出走是一种无奈、一种逃避、也是一种调整、一种寻求。”<sup>[9]</sup> 她的出走体现出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所缺少的主动意识，尽管她身上也有性格缺陷，但面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她想要改变现状，追求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去追寻一种光明、有生命力的未来。“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不能在你那枯庙似的家中枯死……”<sup>[7]</sup> 她身上蕴含着宝贵的女性独立精神和不屈从于封建男权文化的斗志，表现出现代女性意识可贵的觉醒，将激励更多的知识女性能为自我的幸福而奋斗。

还有一类知识女性，巴金赞扬和歌颂她们身上优秀品质，在她们身上寄予理想的性格、美好的感情。如抗战三部曲《火》中的冯文淑，《憩园》中的万昭华，《第四病室》中的杨木华。冯文淑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性格热情活泼，真诚坦率，这使她成为战地工作团的娇儿。其美好的性格、强烈的爱国心及勇于献身的精神，让我们看到众多抗战救亡爱国青年的影子。万昭华是一位有知识和热爱生活的女性，尽管她呆板的生活囚禁，但她通过书中的知识对外界的生活有所想象和慰藉，并对生活和未来怀有美好愿望，希望世界上的人都能过相互援助友爱的生活。杨木华热情善良，给予病人帮助，积极救助受难的人，在地狱般痛苦的环境中，用温暖的笑容给遭受苦难的人心中带来一丝光亮。巴金笔下的女性人物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中国传统女性美德的特征，又一定程度受到先进思想的光照，给人心灵的力量和希望、温暖。

## 5. 结论

巴金的小说塑造新旧时代交替期的一群“知识青年”人物群像，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的笔触总是能通过描绘个人的性格特点，有意无意“带”出一个时代的面影。从《灭亡》、《新生》到《激流三部曲》、《抗战三部曲》，他入木三分的解

剖建旧制度的罪恶、深入“知识青年”的内心世界，道出他们细腻的情感，辩证地进行了人性的批判，留下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份珍贵的艺术记录，对于那个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冲出旧家庭的束缚，走向革命，起到启蒙的作用。同时，巴金小说中的知识青年群像展示了现代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共同经历的为理想不畏牺牲、不懈奋斗的思想历程，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透露出进步、民主、科学、自由的时代精神。

## REFERENCES

- [1] Ba,J. (1983)Bajin's theory of creation.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Shanghai
- [2] Ba,J. (1987)Bajin's complete works(volume IV).People '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3] Ba,J. (1987) Bajin's complete works(volume VI),People '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4] Ba,J. (1987)Bajin's complete works(volume XII).People '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5] Ba,J. (1987)Bajin's complete works(volume XX).People '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6] Ba,J. (1987)Bajin's complete works(volume I).People '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7] Ba,J. (1987)Bajin's complete works(volume VIII).People '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8] Cheng,SH.(2005)Castration, Usurpation and Idealization - - On the Father - Son Relationship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Guangdong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Guangzhou
- [9] Zhang.XN.(1998)On Women 's Self Choice of life - Also on *Cold nigh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es series, (2):29-41